

19.18



海康文史

1

1988

(总第九期)



广东省海康县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总第九期)

目 录

1988年6月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青年运动的回忆.....	吴 年 (1)
扶柳村民奋起抗击日伪记.....	宋国恩 林日兴 (8)
曾锡驹生平纪略.....	岑锦彭 (9)
“万花油”的创制人蔡忠.....	蔡光玉 (12)
留法老前辈蔡乃瞻.....	蔡如祺 (12)
我的三伯——温应盛.....	温国英 (13)
海康教育界老前辈苏炳圻.....	林日兴 (14)
海康体育界知名前辈.....	吴 流 (15)
雷公庙与雷祖陈文玉.....	宋 锐 (16)
陈昌齐的题画诗.....	符秉孟 (21)
雷剧音乐变革史略.....	唐南生 (22)
雷阳书院——雷州师范.....	郑培兰 (29)
海康民盟及民盟县委会成立前后.....	卢彦培 (30)
旧事今话 (续一).....	郑 柏 (34)
补白：和陈允偈同志《烈士三十五年祭》诗.....	潘文来 (40)
海康医药行业史略.....	关恩兆口述 蔡卢杨整理 (41)
漫话海康番薯.....	丁崇正 (43)
海康汉族居民来源及分布.....	蔡叶青 (48)
海康县名初探.....	曹建华 (51)
正视历史，走出误区——译林云奉《仅徐闻县治讨网村遗址考证》.....	黎也松 (55)
闲话黎国成《隋前徐闻县治再考》.....	我雷州人 (59)
封面照片——雷州西湖公园.....	曹建华、林青摄
封二照片——海康县博物馆.....	曹建华、林青摄
封三：海康县行政区划情况表.....	海康县地名办供稿

抗日战争初期

广东青年运动的回忆

吴 华

编者按：《羊城晚报》1987年12月30日讯：“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的部分老队员和广州地区青年学生代表共250多人，今天上午在广州集会，纪念抗先成立50周年。”

“抗先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广东省的党组织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全省统一的爱国青年抗日团体。它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向全省，引导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在广东青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年抗先的一些领导骨干和支持抗先活动的老同志刘田夫、梁广、云广葵、谭天度、吴华、于光远、左洪涛、梁嘉、陈思、朱荣、欧初、李大林、黄煥秋、陈能兴、温耀华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明、团省委书记江海燕、副书记李正彪出席了纪念大会……”

上面提到的吴华同志，现名吴济生，又名吴壮飞，原籍海康县人，1913年生。193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派他返广东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38年5月至1940年8月，曾任中共广东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青年部部长。解放后，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司长等职，曾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后又跟随刘少奇、周恩来访问过亚、非、欧等二十多个国家。现已离休。

广州青运史研究室撰写的《广州青运史研究工作回顾》一文中写道：“原抗战时期中共广东省委青委的负责人吴华同志离休后，不但积极地为我们撰写回忆录，还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抗先’简史的审稿会。”

吴华同志于1988年2月10日应海康县委主要领导的邀请，返故乡探望乡亲，参观家乡解放以来建设的成就，对家乡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许。

值纪念“抗先”50周年之际，县政协委员、文化馆符秉孟同志为本刊提供吴华同志抗日战争初期广东青年运动的回忆及有关照片。这是一篇很好的史料，特全文刊登，以饕读者。

近曾参加广东党史座谈会，听到许多老同志谈及广东党组织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和情况，使我回忆起30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广东青年运动的一段历史。50年前的史实，记忆起来不够全面和确切，只能作片断回忆，提供当年参加青运的战友们参考。

重回广州，同战友们并肩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广州处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运动暂时沉寂了，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群众运动重新掀起了高潮。在党中央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广州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先后成立许多革命的秘密的文化团体。其中广州中山大学接受党政治思想的进步同学，于1932年1月建立了“中大抗日剧社”，并同上海党领导的左翼左翼戏剧家联盟联系成立“左翼剧联广州分盟”，后又和上海来广州培正中举任教的党员陈黄光同志共同建立“苏维埃之友会”，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从事左翼文化戏剧活动和党的情报工作。那时我是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学生，参加这几个团体的组建工作。直到1934年的5月为陈济棠反动当局破坏，封闭“抗日剧社”，缉捕三个团体的全部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我和其他同志不得不离开广州，逃亡到香港、上海、北平（北京）等地，继续参加革命运动。

我于1934年7月到北平，翌年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期间于1935年12月下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革命同学，经过南下扩大宣传后，于1936年2月成立了先进革命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我参加进去成为其中一个成员。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党交给民先队的任务是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扩大活动领域，从北平、天津发展到全国各地，建立全国各大城市的民先队部。到1936年底，全国成立了31个队部。在我返粤以前，清华大学民先队的中共党员

于光远、黄秋耘同志先后到过广东，发展过一批民先队员，但没有建立队部。

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推倒了地方陈济棠势力，进入广东，政治局面起了某些变化。利用双方势力交替的时机，不少受过迫害的进步青年，又回到广东活动。我于1937年夏从北平返回广州，当时民先总队部给我一个临时的工作任务，要相机筹建广东民先队部，介绍我同香港华南救国会联系，我在香港先后接触李章达先生和连贯、吴华菁、罗雁子（理实）等同志，了解广东青运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但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未转到，尚未取得广州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

我从香港回广州后，通过香港华南救国会的介绍，见过许多新旧战友，主要是同党领导下的“学筹”（广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备会）的负责人黄泽成、陈下、吴凤珠、温盛烈等同志接触，互相交换意见，由我介绍北平民先组织的活动情况，探讨在广州能否建立民先组织。我在广州从事过左翼文化革命运动，这次回来重新学习，了解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情况，国民党内部派系力量的矛盾，敌我力量对比，摸索开展工作的途径。可是，因为未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故当时未能取得广州地下党和“学筹”等秘密革命青年组织同志的完全理解和全力支持。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在广州想尽办法完成建队的任务，便重新结合“抗日剧社”的旧战友，寻求打开局面、开辟工作的途径。

这时已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前夕，被国民党监禁的“抗日剧社”等三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李克钊（注①）同志获释放出狱，同他一起的狱中难友邓明达、李健行、陈嘉（杜襟南）等同志也获得自由，我同他们会了面，都参加了民先，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不久“七·七”抗战爆发了，北平沦陷后，我不能回去，就留在广州。广东籍的平津各大学的同学陆续回到广州，唐健等从华北南返的民先队友，成立了平津同学会。唐健、何泽等同志也参加了我们在广州组建的民先工作小组。这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

成立以前，我在广州接触到的一些青运情况。

克服“左”倾关门主义，

注意工作方法

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有革命的传统，广东党有光荣的历史，广东党组织虽然多次受到摧残和破坏，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广州各大中学校师生也立即响应，举行了三次抗日游行大示威，革命的青年组织纷纷建立，青年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6年，中共北方局先后派薛尚实、王均予两位同志到广东，重建了党组织。在民族革命高潮形势下，革命青年学生要求党领导走抗日救亡的道路，以党员为核心，在广州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青”和“寒进社”，领导青年学生群众开展抗日文化活动，组织了“艺协”、“梓社”、“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同时产生了秘密“学筹”，以争取公开成立“学筹”。这些都是抗战前夕广东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也是青年运动的基本队伍。

虽然有了核心和各种公开的青年革命组织，其性质还是狭隘的脱离广大群众的组织，实际是地下状态的第二党形式的青年组织，还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不符合党中央1936年11月决定改造共青团决议（注②）的要求。组织成员只是在少数革命的进步的学生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没有对广大青年开门，因此，要打开广东青年运动的局面，必须彻底改变作风，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团结多数。

我们回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走过曲折的道路，运动时期，曾有过长期罢

课、血衣展览、抬棺游行等行动，可是，没有取得社会上广大人士的支持。少奇同志到了北方局后指出，必须彻底肃清妨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久，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北平学联发表了争取“师生合作”和告社会人士书，提出拥护当时华北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这样才开始扭转脱离广大群众的局面。在组织形式上，中共北平市委执行党中央关于改造共青团的决议，取消共青团，不再保持在当时比较狭隘，并且因在国统区列为非法组织，故很难在青年中开展活动的共青团。我理解，1936年建立民先，就是我党在国统区进行青年工作策略上的转变。取消共青团后，北平学生运动，党主要依靠学联领导下的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和以民先核心的社会青年团体，公开发动进行。后来，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限制和禁止，党中央决定采用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团结组织广大青年群众，民先也不再发展了。

根据这方面的经验总结，结合广东的具体情况，我们和“学筹”负责同志研究，要打开广东青运局面，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彻底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正如抗战集体讨论青年救亡工作者的作风问题总结上所指出的，除了客观原因，广东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左翼革命组织，屡次遭到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只得采取慎重的在“纯粹又纯粹”的进步革命青年圈子中进行发展，“保持着狭隘观点”，对同盟友军也抱着“漠不相关”的态度，对一般落后群众“不理不睬”。“中青”可以说是广东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但没有向广大追求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开大门，参加“中青”前，还要通过“十人团”的外围组织考验，才能被吸收进去。“学筹”仍是处在地下秘密状态，没有面向广泛

注①李克钧同志即李易扬，著有《打回老家去》、《最后列车》、《抢米》、《空袭》剧本。

注②参见《党史通讯》1984第七期《关于一九三六年根本改造共青团的问题》一文。

的青年同学。我们还觉察到，这些革命青年组织的一些同志，还存有地方宗派的残余思想，对北方回来的同志，有点戒备和怀疑，当我的党组织关系还没有转到广东党之前，“学筹”负责同志曾告诉我，不是采取完全信任和真诚合作的态度；革命青年组织之间也存有非原则性的矛盾，各自发展，互相猜疑，抵消力量。我同他们商讨，觉得需要克服关门主义，改变“地下形式”的狭隘的政党型的青运组织，才能适应抗战爆发后的大好形势，把要求党领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青年组织起来。

利用矛盾，从秘密到公开合法

广东党及时在领导青运负责同志中，进行思想教育，彻底改变作风，不单独看到自己领导下的少数左翼群众，而且采取公开的组织形式，团结广大青年。

广东党组织对我们从事青运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克服“左倾”关门主义教育之后，大家统一思想认识，接着的课题就是把我们的外围青年革命组织，如何从地下秘密状态转到公开合法，组织更广泛的青年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去。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中央势力赶走陈济棠，进驻广东，而同新的余汉谋地方势力仍然存有矛盾。“七·七”抗战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广东青年继承大革命传统，有高度的民族、革命的觉悟，要求我党领导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而国民党虽然感觉到不能逆潮流而行，也注意到领导所谓民众运动，企图对青年运动包办、控制，他们试图通过国民党省市党部，各自成立党部领导的青年团体，可以对青年运动包办、控制，他们试图通过国民党省市党部，各自成立部领导的青年团体，可以包办所谓“民众运动”。可是，当时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同地方势力之间，存有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相互间有斗争，其中限制青运、包办青运的

消极压制的主张，和主张采取积极领导从而树立它的领导权这两派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自淞沪抗战后，全国救国总会郭沫若和七君子等领导人南下。在广州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我们在党领导下，举行了“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简称学联）。广州市党组织有计划地充实党领导下各青年组织的基础，团结周围群众，这样击破了国民党控制包办青年运动的阴谋。

当时，在国民党方面，掌握“民众运动”领导权的，主要是国民党省市党部的C.C.派系，负责人是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书记长谌小岑，市党部书记长陈宗周；此外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接近孙科系的省党部特派员钟天心，地方军人余汉谋的亲信李熙寰，都各自企图建立自己控制下的青年群众组织，彼此间也存有矛盾。对抗日战争态度，地方军人实力派余汉谋是坚定主张抗日的，省政府吴铁城是动摇的，孙科、钟天心派系比较开明。C.C.系为了抗衡地方势力，争夺群众基础，巩固他们在“民众运动”方面的领导权，在建立青运组织上，比之地方势力更加放手去干。总的来说，国民党方面没有形成全市的统一青年组织，又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不能垄断所谓“民众运动”。

我们分析以上情况，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来建立我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阵地。首先夺取的基地，就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的“救亡呼声社”，谌的支持者是亲英美派的C.C.系曾养甫（广州市市长，省党部特派员）。五四运动时，谌参加过周总理领导的“觉悟社”，到广东后，政治上表现较开明，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想在省党部名义下搞出点名堂，使自己成为广东“民众运动”的官方领导人。我们“民先工作小组”的邓明达同志，在国民党省党部民运科工作，取得谌的信任，他作为桥梁可以沟通各方面的情况，因此，广州党组织决定派出相当数量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救亡呼声社”，使它变为我党进行青运的公开阵

地，广州市党组织也派出各战线的负责同志参加“救呼”，积极支持它。同时C.C.系另一头头余俊贤组织“青年群众文化研究社”，国民党市党部C.C.系的书记长陈宗周组成“广州市学抗会”，我党都有计划地派党员参加进去，这样，使这些名义上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团体，实际领导权却掌握在我地下党员手上。地下学筹藉此动员群众援助华北抗战，发起组织“广州市学生华北抗战后援会”，争取向国民党市党部备案，开展工作，但没有取得同意。

1937年秋，国民党建立起“党政军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会议，企图统一内部派系思想，交换情况来控制广州市群众运动，还成立一个“广东省民众御侮救亡会”，谏小岑担任该会的组织部长。通过谏的关系，我们以“救亡呼声社”名义，派了不少党员同志担任广州市几个重要地区的指导团负责人，更有利于我们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党领导的大规模的青年群众运动。

从分散到争取统一， “抗先”的建立

当时广东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的工作方针，是使党的组织成为有群众基础的党。按照这一方针，我党在领导的青年运动中，建立了多样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作为建立与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充分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利用他们想争取群众的意图，而设法使我们所建立的青年组织，都获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青年社团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但组织形式是分散的，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组织。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京沪沦陷，华南局势日益紧张，在这客观形势要求下，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长江局和省委指示，广东青运可以通过青年团体自发联合的方式，把全省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党更便于部署指挥青运，配合建党的路线，教育青年，执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建立广东青年统一战线采用什么名义，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在研讨的过程中，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是用华北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民先名义，还是根据广东的具体情况来定名。经过半年来的工作实践，同广东青运干部研究的结果，认为民先的政治面目过于突出，不适合国民党统治区后方的广东客观情况，而且了解到国民党已通令禁止民先活动，准备在国统区强行解散民先组织。广东党组织注意到这种情况，认为根据这些情况，应该用广东地方名称，经向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汇报，同意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来建立广东青年统一战线的组织。

在筹建“抗先”过程中，邓明达同志运用他在国民党省党部民运科工作的社会关系，有利于我们了解国民党控制“民众运动”的企图和做法，找出打开青运局面的对策。李克筠同志对于如何运用国民党的力量，建立抗先，提出了许多宝贵可行的意见。抗先初期的发起宣言、组织大纲，他是主要拟草人之一，并且是队报负责人之一。他还亲自到增城县筹划建立农民武装力量，广州沦陷前，他有在粤北发展青年武装的蓝图，不幸从广州撤退在清远途中，染了疫症病倒，离开人世。他为广东青年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永远怀念着他的。

在酝酿建立“抗先”的过程中，我们曾试探国民党省市党部的态度，他们对建立广东青年统一组织是冷淡的，认为省市党部可以控制包办。但是，我们领导下的进步的革命青年组织所发动种种具体工作，完全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组织日趋巩固健全，他们也感觉到我党在青年运动中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失去了这一力量的支持，在当时国共合作初期，对他们也不利。这就客观上推动了省市负责青年工作的国民党上层人物统一了认识。当时，他们也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命令，要加强国民党对青运的领导。省市党部余俊贤、谏小岑、陈宗周三巨头相互间达成谅解，想以他们名义上领导的救呼社、青年群社、学抗为基础，成立统一

性组织去统一其他青年团体。一次，我同陈宗周谈话，他说：“我请诸先生做抗先总队长，相信你们一定能接受，至于我自己已经到‘学联’方面负责了，对‘抗先’只好从旁帮助”，这是国民党上层内部的分工。他们对诸领导的救亡呼声社力量的发展，过于依靠革命进步青年，有些不信任。诸当时也想把抗先发展成为军事性质的青年武装组织，由国民党省党部直接领导，装备训练，我们加以拒绝而按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进行。抗先要向国民党省党部注册备案，但中山大学抗先也向余汉谋献旗，听取他的“训话”，来表明抗先不是依靠国民党某一派系的力量支持，也非某一个人所领导的组织，这就减少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摩擦，促进他们的团结抗日，而保持抗先这个革命青年组织实际上在我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有利于开展广东青年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党中央青委的充分肯定。

抗先的筹备建立过程，在抗先文献和广东青运史料中有许多同志的回忆文章，已有详尽的叙述，我不再重复了。

独立自主，坚持斗争

广东青年运动是按照党中央方针政策，在省党委具体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方针，又善于结合广东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抗先的建立就是在贯彻这精神下斗争中壮大成长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将广州作为其统治地区的后方，限制青年学生直接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对青年团体是包办控制，拉拢领导干部，对基层群众则分化压制。其市党部书记陈宗周伪善地找地方和北方来的青运干部谈话，赞扬我们，并表示关怀，每人每月发固定的生活补助，这是他们惯用的收买手法。我们经研究后，决定除了已在国民党省市党部任职的我方人员可以接受其补助以外，其他同志一概拒绝，这是我们坚持青运

独立自主立场的小小合理斗争。

抗先总队部队长人选问题，与他们也有斗争。抗先是青年统一战线的组织，酝酿人选过稳时，国民党省市党部示意以谌小岑兼任总队长，我们考虑，如果同意接受，那将使抗先变成国民党省党部直属下的一个青年组织，经过说理斗争，我们还是决定在八个团体中，选择由救亡呼声社的邓明达同志为总队长。我们是考虑到邓取得谌小岑的信任，故内定由这位进步青年出任总队长，果获国民党方面同意，在实际上由中共广东省委青委的领导下，抗先总队长由邓担任，副总队长和其他领导成员，基本上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

1938年3月，在实际上由党中央长江局青委领导下，于武汉召开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知广东党派代表团参加，我们以抗先、中山大学为主的各方面人员组成十人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当局开始不同意，我们以继承广东革命精神来充实大会为由，进行说理斗争，终于获得国民党省党部正式认可。我带领这个统战性质的代表团前往参加。武汉国民党当局破坏阻止大会如期举行。我们一到武汉，国民党军委会二厅便派特务叛徒梁干乔以同乡出面宴请我们，进行威胁分化。十人代表团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能团结一致，坚持立场，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我被推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代表主席团作了报告，会后中山大学张鉴英同志被推为驻汉代表，胜利完成任务，得到长江局的表扬。

广州失守，抗先根据省委指示，保存干部力量，撤出广州，转移分散到国统区各县开展党的工作和青年运动，经过合法斗争，组成了30多个战时工作队，一方面取得省动员委员会的经费支助和公开合法的战时工作队名义；另一方面打消他们不准用抗先队名义而坚持了我党领导青运独立自主的立场，撤退过程中召开了全体队员大会，选出了总队部委员和各地区抗先队部的负责人，基本上是中共党员。

粤北局势稳定，广东政治中心迁移到曲江（韶关），抗先也按省委指示，在曲江建立总队部。1939年春，国民党看到抗先力量的发展，阴谋阻制抗先，其第一步是扼杀抗先战时工作队。省动委会宣布解散战工作队，停止发给工作费。省委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将战工作队的主要骨干留在地方，在地方党领导下工作，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联系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巩固广东青年统一战线。不参加地方工作的，便集中曲江，进行政治学习，有计划的分配队员参加地方势力的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以及国民党官办的战时组织，支持广东地方势力，许多同志安排到十二集团军各师、旅的政治工作岗位，推动这支非蒋军嫡系部队继续走坚持抗战的道路。

1939年，国民党破坏抗战，颁布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第一次反共逆流，广东各县开始取缔抗先。我们在队员中进行教育，坚定信心，对外开展了合理合法斗争，动员地方群众和开明人士，动用群众斗争艺术，坚持抗先的生存斗争；也根据各地方的具体环境，成立其他形式的青年团体以掩护抗先。在曲江，国民党搞所谓“溶共政策”，强迫抗先总队部同志参加国民党，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参党自由，不能强迫”进行说理，策略上准备个别同志参加，保持总队部的独立自主性质。后来，国民党又进一步企图以三青团包办青运，要求抗先总队部号召全体抗先队员参加三青团。我们根据省委部署，坚持自主立场，说明抗先有它自己的光荣历史，有广泛的青年

群众基础，参加哪一个青年团体，只能按自愿原则参加，不能下达命令；更不能只容许一个青年团体的存在，而解散其他团体。我们坚决拒绝发表号召全省抗先参加三青团的宣言，并说抗先可以接受指导，但不能取消抗先的合法地位。经过斗争，在1939年，国民党方面还不敢公开明令禁止取缔抗先总队部。在我们内部，则进行两手部署，准备应变，抗先总队部全体同志在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斗争，坚持工作。

到了1940年春夏，形势更恶劣，总队部由黄泽成、陈恩等同志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在顽固头子威胁下斗争到底。国民党准备下令逮捕总队部同志，明令解散抗先。我们估计到总队部必然会被解散，根据省委决定，执行两手准备，个别领导同志隐蔽撤退，保存力量，撤退到我党领导下的游击区。同时，争取以新的组织形式，尽量再利用国民党的一些合法组织，开展深入国民党内部的工作，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总队部草拟了被解散时的公开告社会人士书，直到五月，国民党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令解散，但我们已有计划的全部转移，大部分队员在党领导下，在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岗位上坚持抗战和青运工作，在游击区或蒋管区渡过艰苦奋斗的岁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许多人接着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洪流。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党领导下，华南各地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而各支游击部队中的骨干成员，当年原为抗先队员的，比比皆是，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追思至此，使我深切的悼念这些战友。



扶柳村民奋起抗击日伪记

宋国恩 林日兴整理

1943年2月，海康县城再度沦陷于日寇。这一次，日军占据县城之后，当即任用汉奸符永茂充当伪和平队总司令，扶植满清遗老袁洵源为维持会长（后为伪海康县县长），扩大势力范围到各区镇。于是打家劫舍，抢掠粮食之事就特别猖獗了。

扶柳村是个多产粮食的村庄，所产白米，香甘可口，质量上乘，为全县之冠。因此，敌伪军大量派购，甚至无偿地派购。至于索取收税，抓人捆打，诸多寻衅就更不用说了。村民认为，敌人之欲望难填，如不奋起抵抗，暴敌得寸进尺，将永无了日，我们也将永无宁日。为此，村民宋方正、柯春三、宋炳炎、柯杨隆等发动组织本村青壮年为自卫队，约二百多人与百多条枪保卫家乡。

时在1944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凌晨，日伪军四、五百人，由当时驻南兴和平队大队长吴虎文、朱纪孟当向导，分两路包抄扶柳村：一路为伪军，约二百余人，从下尾园村北洋下坡渡西渡花桥溪；另一路为日军，约一百多人，从渡仔南渡南渡河，汇合之后，窜入下尾村，直冲扶柳村。大敌骤至，声势汹汹，村民宋方正、柯杨隆等愤怒填膺，立即率领青壮年奋起反击，起初只在村口找据点抗击，可是敌人炮火猛烈，不久就转入巷战。由于敌我装备悬殊，且敌众我寡，只好退据炮楼，伺机还击。从上午七时至下午六时，用单响枪、台枪、手榴弹便击退敌人四次疯狂进攻。

敌人见多次进攻都不能得逞，便不择手段地使用手榴弹、迫击炮、打射枪尾弹轰炸碉楼，柯杨隆、宋双成两人被弹片射中要害，当场壮烈牺牲了。正当弹尽援绝，情况非常危急之时，困在楼内的五百多人都做了死的打算；有甚不愿被敌人生俘，守在水井边，准备跳井自杀；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刚投入而正在地板上旋转的炮弹扔出楼外，反炸敌人；还有的准备冲出去跟敌人同归于尽。狡猾的敌人看出我们处境困难，便象疯狗一样扑向炮楼。这时，村民梁成已恨不得一股脑儿把敌人消灭掉，他把子弹推上膛，瞄准敌人“砰”的一声，当场击毙带头冲上来的日军（据说他是什么校级军官）。敌人见状，胆颤心惊，不敢再越雷池半步，丢在楼侧的尸体也不敢过来收拾。很久很久才用三、四支竹竿连接起来勾呀捞的。又过了好一阵子，才把死尸拖走。此刻敌人惊惶之余，实已不可能再战，且时近黄昏，恐遭夜袭，因而仓惶撤退，还丢下日制望远镜一副，日产手表一只，派克水笔一支。

凌晨，凶恶的敌人，又以加倍的兵力，卷土重来。村民们认为敌众我寡，武器悬殊，若坚持抵抗，作无谓牺牲太不值得，不如暂离阵地，保存有生力量。果然，来不及撤退的村民就遭到敌人奸淫掳杀，割喉、砍头、挖目，割耳等惨刑，无所不用其极。计有何和羹被敌人抓住，当场剖腹挖目；柯纪殿被制掉一边耳朵；宋欣荣的母亲被砍而死……，有的人虽已逃出虎口，因渡船拥挤，翻覆而溺死的有黄昌平、宋纯仁、柯引之，桥头婆、宋虬生的妻子、陈奉池的女儿等十多人。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人被杀了，屋也烧了，烧毁房屋合计三百六十六多间，还烧毁稻谷50多万斤。至于牲畜及衣服等物之被抢劫更是不计其数。日寇、伪军撤出后，扶柳村的残墙断壁，遍地灰烬，已目不忍睹，而时值寒冬腊月，群众无衣无食，更是令人同仇敌忾，无比憎恨。

扶柳村民遭此屠杀后，群众抗击日寇的决心更加坚定，不少人走向游击区参加了抗日队伍，寻找革命出路。

曾锡驹生平纪略

岑 绵 彰

曾锡驹同志，字冠恒，别号路伯，海康县沈塘镇茂莲村人，1915年出生。童年入海康县立第一小学校，攻书忘倦，耿直笃厚。

1933年，曾锡驹以优异成绩考进省立第十中学（遗址即今海康人民政府所在地）初中第十五班。当时，日本侵略军蹂躏东北，蒋介石执迷不悟，枪口对内，民心愤怒；曾锡驹频抒激情撰写新诗，小说，发表于叶圣陶等主编的进步杂志《中学生》以及其它报刊。初试笔锋。1934年，曾锡驹和同班级的黄其江、唐才猷以及中师班的陈其辉、邓麟彰等革命学生，发动校内一批求进步的学生组织读书会，订出会员公约，经常开展活动，研读社会科学理论新书、国内外革命文学作品和进步刊物如《大众生活》、《永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等，促使广大同学关心国家大事，认清形势。

曾锡驹毕业于初中，继续读中师，他的品格才华赢得同学们的衷心爱戴，被推选为雷师全校学生组织的出版部负责人，主编《雷师期刊》和壁报，面向现实，笔触时弊，揭露国内校内的恶迹丑态。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曾锡驹离开雷师参加抗战救亡宣传队下乡宣传。后来，他到校址设在遂溪宾兴祠的遂溪县立第二小学任教师，和同校进步教师吴定源等筹办一份救亡刊物《风云》，呼吁各界人士支援抗战。吴协助他主稿和撰稿，逐期印发，深受读者欢迎。海康国民党县长看见《风云》第三期载文揭露其县府妨害救亡活动怪象，迫其停刊。

1938年8月，曾锡驹参加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他驻会工作，身受党的教育，经历斗争锻炼，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这年秋，他参加“青抗”的工作队下乡办夜校，首先在遂溪洋青区文相村帮助农民学文化。编写《田头杂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通俗易懂，老少传诵。在文相发动群众，培养农民骨干，为这一地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打好基础。

1939年6月，曾锡驹加入中共遂溪党组织。这年初冬，遂溪洋青中心党支部成立于文相村，曾锡驹任书记。1940年夏，他受中共遂溪县委派，偕同王文劭到沈塘区建立南区党支部。沈塘区当年属遂溪今已属海康。南区党支部是海康县境内抗日战争时期最早建立的党组织。当年，曾锡驹是遂溪县党总支组织委员兼任南区党支部书记。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媚敌反共倍加猖狂，曾锡驹按党的指示，曾一度转入广州湾，在岑黎村借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从抗日战争之初至1942年底，曾锡驹久在农村宵旰辛劳，眼病加深；过去他钻研革命理论，身历多年实践，政治斗争体验日益成熟；过去他熟读陆游、鲁迅的爱国诗篇和戴克家等诗人作品，爱吟旧体诗，又撰写新诗发表于进步报刊，再转而写大众化的田头杂字和雷州人喜闻爱唱的雷歌。他挥笔吟唱，绝非炫己逞名，而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斗争遣怀愤，鼓舞群众。

1943年初，曾锡驹受党组织委派，打进高州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社，以副刊编辑为掩护，进行对敌斗争。身临敌人环布的境地，不顾艰险，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他同

高州地下党员记者杨飞、李军等同志并肩奋战。以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利用报社这一宣传机器，揭露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的罪行；同时凭借副刊，团结当地民主人士，支持抗战到底，还帮助年青作者锻炼笔锋和斗志。1943年3月，留广州湾剧人协会组成以待平为队长的抗日剧宣队到高州时，被顽固分子施以重重压力，势难演出，曾锡驹同当地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尽力协助剧宣队冲破难关，连夜公演抗日话剧，观众多如潮涌。

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对敌斗争日益复杂而尖锐，党组织决定派曾锡驹赴吴川县参加武装起义。后因他眼病加重，走路艰难，组织才叫他转入广州湾临东等村搞地方工作。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蒋介石挑起内战。

1946年，曾锡驹受党组织委派，前赴东兴，打入国民党一五六师主办的正气报社任总编辑。党交付他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五六师师部军政情报，同时开展一些有利于我党工作的社会活动。曾锡驹取得当地搞内线工作的同志的协助，搜集敌方军政机密，及时向党汇报。这段时间他还随机争取团结当地的进步力量。

1948年夏，曾锡驹接高雷地委通知，根据形势需要转入徐闻。地委指派他和莫虹创办《雷州半岛导报》，莫虹为书记，曾锡驹当主编。他们战胜当时当地办报的种种困难，竭力办好此报，宣传党的政策，报道解放战争的捷报，传达支援前线的任务。此报出版至第五期，由于形势发展接近解放，急需培训一批年青干部。1949年初夏，中共高雷地委派曾锡驹创办半岛公学，任命他为校长。公学创立于徐闻原第二区，当年培训干部共一百多人，陆续分配到近邻县区工作。解放后，当年公学培训的干部有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局长。曾锡驹在公学写作的《革命杂字》为许多干部珍存，直至解放前夕仍作为教育群众的课本。曾锡驹随着地委转到东海岛邓屋村，继续出版半岛报。

发动群众踊跃支前，迎接家乡解放。

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湛江市，曾锡驹进入赤坎。解放前他被艰难险阻坚持对敌斗争，还要与病痛拼搏，双眼将近失明，心肺诸病交煎，党组织爱护他，派员日夜随身照顾他，几度劝他疗养，他仍然坚持工作。从1948年起，他的眼病越来越重，只好叫身边的同志按时读文件书报给他静听。他须亲阅的要件，只有戴上深度近视眼镜再加上放大镜细看。解放后，党关怀他宿病多年，送他到广州、北京留医。根据他的所长和心愿，让他从事市的宣传教育工作。

1950年夏，湛江市军管会宣传部为落实市郊夏征和拥护世界和平保卫新中国领土，当时组织本市三十余名教师成立“湛江市中小学教师暑期下乡宣传队”，委派曾锡驹兼任宣传队长，岑牧为副队长，出发郊区各乡较大村庄和圩镇，按宣传部发下文件巡回宣讲，周时演出话剧《白毛女》和演唱《夫妻送粮》、《兄妹开荒》等节目配合宣传，历时三十多天，鼓舞各乡农民踊跃送粮，发动约三万人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保卫新中国。1951年春，湛江市干校举办干部培训班，市委委派曾锡驹抓紧开办和主持讲课。前后将近一年时间，为本市一百多名干部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分派回本市各条战线和土改工作队。从1954年起，曾锡驹先后任市文教局人事科长、副局长。他痛念此地从1899年初称“广州湾”之日起，受法、日侵略者相继统治近五十年，解放后急需提高此地文教队伍的政治素质，因而重视在教师中发展党员作为改变旧校面貌的骨干。他在职期间，亲自培养吸收收入党的文教干部多人，政治表现好，业务有所长，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三十余人连续任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主持学校作出成绩，有的提升为科长、副局长。

解放初期，有的教师曾被冤案错案株连受审查、被关。曾锡驹身无污点，心无顾虑，本着分清敌我、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市领导同志反映，说自己熟悉此人，据自己所

知此人并不反革命。当他任市文教局人事科长时，收到小报告揭某教师写的旧体诗迹近反动，曾锡驹细阅此诗，实系小报告有所曲解，他找此教师着意教育后不作处理。事实证明曾锡驹真知灼见，不坑害人。

1957年反右前夕，曾锡驹心脾病并发，引致眼病沉重，他作书面发言痛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背离实际的失误。不久，曾锡驹申请病休的报告得到市委批准，他即带全家老少迁移户籍回故里茂莲村。老曾回故居后，海康县许多老同志年年登门慰问，乡邻不少老相识登门拜访，湛江地区、广州、北京等地许多他的老战友纷纷远来找他畅所欲言。老曾天天伴着故园的老柏和黄花度过反右的岁月，经过疗养，他的病势日见好转，海康县领导干部盛意请他移居县城，在疗养的同时指点县中文化干部开展雷剧创新工作。老曾到海康城后，疗养生活各方面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乐于竭诚余热。从此，年青干部天天前来求教，老友新识天天相继走访，老曾天天忙着接应，病痛随之复发，只好重回茂莲村。

“文革”十年间，南天北国凡是有老曾的战友所在地的那些昙花“小将”，相继窜到茂莲村企图向老曾挖出揪斗其战友的材料。老曾正襟安坐坚持实事求是，端出这位战友的实际经历说明他是好同志。来人记录老曾所谈，一字之差必须改正。有的来人诬蔑革命老干部为叛徒，老曾凛然斥责：你清楚么？何用找我？”来人灰溜溜走了。老曾在病中选经数十个这类人纠缠，他叫儿子把家里日常需用的东西和书籍，从他的卧房搬出去，自己准备好不付出任何代价坚持党的原则，坚持革命正气，面向那些昙花红人决不动摇，他坦然陪着家圆的老柏和黄花送走

了十年动乱，在卧室挂上了周总理的玉照。

1980年初，老曾病情日加恶化，湛江市领导闻讯深切关怀，通知市人民医院派救护车迎接老曾到霞山留医，经多方抢救无效，1980年3月22日曾锡驹同志逝世，本市干部、教师、乡邻知友，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唐才猷等老同志闻耗奔来和老曾遗体告别。翌日举行的追悼会的礼堂中，摆列着省、地区和市首长与许多同志送来的花圈，八百多人拥进这座礼堂。年青的同志情声问邻座：为什么大家对这位病休回乡已二十多年的副局长这样敬重痛爱？——市委组织部长郑文奎主持追悼会，市文教办主任、市教育局局长陈其辉致悼词，扼要讲老曾的战斗经历之后说：“曾锡驹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决议。他在斗争中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苦干实干，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生活中艰苦朴素，关心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长期来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曾锡驹同志不愧为我党的好党员，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悼词给予老曾的评价十分确切，老曾毕生为革命鞠躬尽瘁，不顾身家，不图逸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前不帶过一块手表，不制过一袭象样新衣；身后遗物不过一椽破屋，半柜旧书，几张残椅破凳。解放前老曾写过不少旧体诗，其中有《咏牛》可见斯人心愿：“牵犁还宿愿，茹草尚情甘；冷笑豪门狗，悍然不自惭。”

“万花油”的创制人蔡忠

蔡光玉供稿

蔡忠（1844—1943）一名蔡世昌，海康县客路镇禄盘村人，他出身贫寒，八岁而孤，九岁应雇牧牛，十一岁进戏班学艺。由于爱好武术，为班主所器重，于十四岁时被送到福建省少林寺专攻武术两年。学成后，重返戏班工作。二十二岁时，离开戏班往新加坡谋生，以行医为业，开始创制“万花油”，产品畅销东南亚。

1898年归国，定居广州，仍以行医为业，并设厂制造“万花油”。“万花油”为骨伤科圣药，至今已风行百余年，畅销中外，名闻世界。日寇占领广州后，蔡忠便于1943年春转回故乡。1943年秋病故于原籍海康县客路镇禄盘村老家，终年九十九岁。

抗战胜利后，他的儿媳蔡继承父业，在广州复厂制造“万花油”。解放后1955年合营后交由敬修堂药厂生产联营，将“万花油”配制药方，提炼工序献给国家公开投入联营，并将广州市上九路二间药厂折价投资生产。

留法老前辈蔡乃谔

蔡如祯

蔡乃谔（1900—1983年），别名德勤，字仁宾，海康县客路镇水标村人。1920年由海康县考试择优公费送赴法国留学，在蒙伯利耶大学的化学学院毕业，取得化学工程师学位，一度留校工作。1925年秋归国，定居广州湾（当时是法租界，即现湛江市）。1926年至1932年，在广州湾安碧沙罗学校华文学任理化教师。1934年至1937年在广州商品检验局任检验员。后调福建厦门检验分处任检验股长。1947年至1948年被选为海康县参议会议员。1956年在粤西汽车运输公司董事会任秘书。1958年任湛江地区汽车保养场机油翻新技术员。1963年退休，1983年2月因病不治，在湛江逝世，终年82岁。

他归国后，对当时现实不满，不参政，只从事化学教育和工商运输事业。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要求他们奋发读书，树立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

解放后，他曾先后被选为湛江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湛江市政协委员，湛江市工商联会委员，高雷专区公路运输联营处车商福利互助会主任委员。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公私合营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起了积极作用，为祖国繁荣昌盛，振兴中华做出了贡献。

他生前衷心培养其子及侄子（他胞兄之子）攻读大学，毕业成才，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服务。

我的三伯——温应盛

温 国 英

我的三伯父温应盛，字“和鸣”，祖籍顺德龙山乡，后改籍海康，1896年出生于雷城镇下河里，1952年去世。他与我父亲是孪生兄弟。1920年赴法国巴黎留学，1929年返海康，获得法国洛达里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当时海康赴法留学生中，除他外还有雷城镇崩城巷的游康漠、雷城镇苏楼巷的吴锺麒（吴天龙之侄）、客路镇水标村的蔡乃驊。海康传说的土洋两名硕士中，他就是“洋”的一个；另一个“土”的燕京大学文科硕士是苏楼巷的唐如介。

我知道他留学的年代，倒是从乡亲贺送他的木刻楹联序文中读到的。联为前清廪生陈骏嵩所撰，海康第一小学教员欧国梁所书。其联曰：“游遍西欧九载业成归祖国，学宗东鲁一时名重噪儒林”。

三伯回海康的第二年出任广东省立第十中学校长，在任约年余。他因接到留法同学郑毓秀（上海高等法院院长、后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驻美大使魏道明之妻）电约赴上海工作，于亲友饯别宴会上酗酒致精神病发作，未能成行。初达癫狂，后转入痴呆，缠绵医治了六、七年，才渐复正常。至1935年，雷州师范（十中于这一年改名雷师）校长，留法学生吴炳来才聘请他出任雷师教员，直至解放。解放后，雷师校长吴林把他解聘了，他找到原先教过的学生、海康县长萧汉辉，才把他安排到企水附近一家小家。1952年病逝于工作岗位上。

以上就是他单纯的一生：读书——教书。

家庭出身的富裕和工作经历的单纯决定了他性格上的慷慨、随和、疏懒以及与世无争，由此而获得“甘草汤”之名。但或许因之也养成了他留学花都巴黎时那花花公子的浪荡生活。他酗酒导致的精神病（苏楼巷吴锺麒返国后也发精神病），可能也植根于此。

他出国时，我尚在幼年。见到他时则在他返家之后。记得我家居在澳门时，祖母常为他筹汇法郎而慨叹。说他花费太大，相当于别的留学生（更不说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了）的十倍。也许正由于此，他的好友很多。其中后来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者不少。如：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上面提到的郑毓秀夫妇，不久前去世于美国的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父亲马玉行。他曾寄寓过巴黎马家，也拉小提琴，故常见到童年的马思聪（我认识马也因此关系）。还有原国际联盟、联合国秘书吴秀峰，则更是他的至友。吴现健在居北京，近年有信给我，谈及三伯留学时的生活。吴在法早与周恩来总理相识，解放后，总理电约回国，长期任国务院参事，现任民革中央常委。此外，我国著名文学家、诗人，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也是他的至友之一。1929年三伯归国时，梁先生由巴黎护送他登舟同返，因他在法早已酗酒失常了。哪料船至中途，从越南的西贡上岸，他又酗酒，动手打了警察被扣，梁先生急电我家，祖母乃派出我五叔父及表伯王澄波（调风楼切村人）赴西贡保释，接他回家，梁先生才折返巴黎。这时，我在海康第二高小读书，故知之至确，记忆犹新。

他在教书期间的学生中，现成为有名的革命干部者也不少。如：第十中学学生郑为之（遂溪人，原我国驻丹麦、阿根廷等国大使，离休，现居北京），郑仲瑞（即郑星燕，遂溪人，原广东党校校长，离休，现居广州）等；雷师学生中，与我同时在学的有：黄其江（遂

溪人，原广东高教局局长，离休，现居广州），唐才猷（海康人，原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离休，现居广州），莫卫（遂溪人，原湛江地区专员，已故），陈其辉（遂溪人，原湛江市委宣传部长，离休，现居湛江霞山），萧汉辉，（海康人，原海康县长，离休，现居湛江赤坎）。此外，在全国特别是湛江各县区各战线中年以上的干部中为数就更多了。

三伯温应盛，当年可算是个知名人士。但他没有当过“官”（除非校长也算“官”），他没有当官的气质，也不是那块材料。由于他中年归国后家道中落，生活越趋贫困，被校长吴林推出馆师后，萧汉辉安排他赴企水附近村小学时，旅费无着，还得雷师学生邓允提倡助才能成行（这是邓不久前告诉我的）。他娶的三伯母官氏（陈骏嵩甥女）无生育。任雷师教员时娶庶伯母王氏（黄略村人）租居雷城南门内萧汉辉家（现县府内）后生有一女，名玉娟，一子名国强。三伯去世时，官氏伯母因饿病死，王氏伯母携子女奔赤坎娘家，继外婆死后，王氏也饿病死。玉娟为曾家收养，改姓曾，现在湛江第一建筑公司工作，丈夫是公司的副经理、工程师；国强为陈家收养，改姓陈，现在湛江化工厂当工人，还未有成家。

随着光阴流水的淘洗，一切都会淡忘。三伯父的影像在我的记忆中也渐渐模糊了！只是萧汉辉同志还保存着一本雷师同学录，得以有次我再看到了他的像片。至于他的名字，也不过偶尔出现于他曾教过，现仍健在的一些学生的口头上罢了！

海康教育界老前辈——苏炳圻

林 日 兴

苏炳圻（1874——1949）字秀南，海康县客路镇迈港村人。清附生。他于光绪三十二年毕业于高等学堂后，便于光绪三十四年到海康官立高等小学堂担任教职，勤助学堂长梁成久抓教学。民国元年，改学堂为学校，梁成久辞退，他就被任用为该校的校长。

他担任一小校长三十七年（1912——1949），海人不倦，卓著勋劳，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称许及学生家长的爱戴。当时县长赵藻，以其教学有力，特赠一横幅绣上“卓矩丰规”，以资鼓励；继之许济县长又以“苦干卅年”绣幅相赠。他以此殊荣，弥感任重道远。对内则团结老师，关心同学；对外则刚正不阿，排除国民党地方派系之干扰。所以一小校园安谧，有“世外桃源”之誉。当他殚精竭虑，严谨治校之时，地方派系愈演愈烈，竟通过当时海康县县长薛文藻之手，伤令其退休。

他一生为教育事业竭智尽力，四十年如一日，在海康教育界，殊属罕见，时人特筹办“秀南中学”于城内城隍庙遗址，以资纪念。

炳圻校长选用教师注重“事业心、人品、学问”三条件。对卓尔不群者，还破格高薪聘请。一经聘用，也不轻易解聘。因此一小教师思想安定，职业保证，没有失业之虞，就专心致志地工作。尤其是对老师关怀备至，经济公开。如：每当学期结束，所节余之公仆费，本应归其私囊，可是他沾染丝毫，概由教师摊分。所以得人称赞，受人尊重，人们乐与之共事。至于他个人之养性、修身，也堪为我们效法。他自奉甚薄，有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生活作风。他深究勿药之术，饮食有节，起居有时。晨昏多练“八段锦”，有时静坐。所以一生病患极少。他秉性谦和，不阿权贵，不臧否人物，与人和睦相处，谨守“和为贵的处世箴言”。

海康体育界的知名前辈

吴 流

黎朝贵，一九一五年生，白沙乡塘尾村人。1932年上海江南体育专科学校毕业，1947年参加香港官办体育训练班一年。历任省立琼崖中学（迁湛江时）、海康中学、香港仿林中学、琼山东山中学体育教师四十五年，系海康铁心足球队创始人之一和主力队员。该队曾代表海康参加建国前的广东省第十二届（1933年）、十三届（1935年）运动会足球赛，并各获第二名。他个人在第十三届省运会中以4'42"获县级联赛甲组1500米跑的第一名。在十四届省运会（1937年）以2'10"2和4'39"分别获得800米、1500米的冠军，并双破省纪录。在十五届省运会（1942年），他以57"1获400米跑的第三名，为我县代表队夺得省运会田径团体总分前四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十年代他以职业足球队员身分参加比赛。1940年参加赤坎队对香港足球联队比赛，以1:1踢和。1939年在广州湾（今湛江市）与法国舰队田径对抗赛，以2'4"破当时全国800米跑纪录，取得第一名。

四十年代他参加香港华人南华会田径队，1947年到广州进行对抗赛，1948年与香港英国队进行对抗赛。

五十年代起他在海南东山中中学搞游泳训练工作，1959年代表海南钟声队参加省田径运动会，获4×100米接力第三名。

建国后至1960年历任海南区足球比赛裁判长工作。现退休在家。

李延华，字元华，1924年生，白沙乡水美村人。广州体育学院进修毕业。擅长举重、体操、武术、跳水项目。1945年在广州湾参加公开组举重比赛获冠军。1946年获湛江市水上擂台赛第一名。1947年组织精武杂技团到香港、广州、江门等地表演杂技武功、技巧，主演徒手汽车过腹（卧地让汽车轮胎从腹部碾过），曾在港九、元朗、上水、大埔等地演出半年之久，备受欢迎。

建国初，任海一中体育教师，对开拓海康体育事业不遗余力，后调湛江任教。历任省、市跳水、举重、体操、武术等项裁判和高考体育专业武术主考和裁判长。由于辛勤耕耘，培养出系列体育人材。现跳水健将兼国家跳水队教练陈观贤，八一女篮教练王卜等都系其高足。现任湛江市工人文化宫健美院副院长兼教练。

翁维祺，1915年生，雷城镇城西翁宅人。广东农专毕业，系海康铁心足球队创始人之一。1933年、1935年作为县足球队主力队员连续参加第十二届、十三届省运会县级足球比赛，均获第二名。1934年随海康队参加茂名县运动会的足球邀请赛获第一名。1935年在县第二次运动会上以1.72米的成绩获跳高冠军，创建国前我县男子跳高纪录。1946年代表县队参加第八行政区运动会作为主力队获足球赛第一名。建国后，1951年参加县跳高比赛仍获冠军。

八十年代以古稀之年仍参加老年人环城跑比赛和坚持每天步行五公里以上的锻炼，现退休在家。